

# 第一章 党的创建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华民族的生存绝境激励了时代的先行者和先觉者。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走到了一起，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湖北作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地区之一，党的组织逐步在武汉及其周边区域建立和发展。以发动工人运动为中心，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湖北党组织领导发动了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人运动狂潮。

中国共产党的宏伟历程从此起扬帆破浪，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从此历火淬金。

## 野火春风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儿女奋起反抗外敌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发出“振兴中华”的震耳呼声。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自强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戊戌维新的失败，“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前路漫漫，只剩下了革命一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引发了全国性的反清运动。辛亥革命如疾风骤雨，迅速宣告清王朝统治的覆灭。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夺取。枭雄窃国，倒行逆施，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只是换上了一个民主共和招牌，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纷争，军阀混战，中华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分子一度沉浸在苦闷和彷徨中。

“入民国以来，更觉有一惊心动魄之气象”，“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一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的湖北红安人董必武，对辛亥革命后沉闷的社会空气，提出了犀利的批评。

痛定思痛，董必武等感到必须从宣传和教育入手，从思想上唤起广大民众。

董必武的思想代表了先进的中国分子对现实问题的共同思考。船坚炮利并未能阻挡列强的瓜分豆剖，没有文化和民众根基的民主共和也如同沙滩楼阁。要彻底莫立新制度，必须培育新的文化，造就新的国民。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以凌云健笔，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及其伦理思想展开猛烈抨击，在万马齐喑的中华大地上振臂疾呼。

一场呼唤青春中国、青春国民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新的时代强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风雷激荡。

这场运动的兴起，使一切阻碍新思想传播的封建思想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思想界激情洋溢，风起云涌。

新文化运动吸引着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的恽代英，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撰写、发表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文章。自1917年起，恽代英开始在武汉组织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学生进步社团，联络黄负生、林育南等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砥砺品行，关注社会，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武汉一时成为继上海、北京、天津、长沙之后，中国又一个新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

思如春雨润大地，笔若秋风写新声。包括湖北先进分子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以笔为枪，结团组社，他们的奋斗和探索，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已经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充分显露，使原来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理想的中国部分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在俄国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客观事实，给不断探索和渴求中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鼓舞。

武汉各大报刊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全面报道。《汉口新闻报》为此专门开辟“俄国政变与欧战前途”专栏，对十月革命进行了集中报道和评述。

1918年7月和11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表《俄法革命之比较》《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宣传。

这是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大事件。在它的影响下，武汉成立于十月革命后的进步青年团体如利群书社、黄社、辅仁社、日新社等，在继续进行新文化学习和宣传的同时，更加注意现实问题，爱国和救亡逐渐成为他们讨论和思考的主题。恽代英认识到“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

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对中国严酷现实的深入思考，董必武和恽代英等湖北先进分子，在此后的探索中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 爱国呐喊

新文化运动如浩荡长风，扫荡了旧思想的阴霾；十月革命如绚丽彩虹，照进了黑幕沉沉的神州大地。

中华大地曙光初现。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像引爆中国的一把火，进一步照亮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的爆发因缘一次偶然事件，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同时，它又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立志救亡图存的先进中国分子，长期蓄积的爱国激情的总爆发。

这场爱国运动，以大中学生为先锋，率先在北京狂飙突起。

5月5日，武汉各大报纸相率报道北京学生的游行消息，次日，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奋笔疾书，草拟了宣传传单。“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不要把盗贼认作父母”的沉痛呼声，唤起了武汉人民的强烈爱国热情。

5月9日，武汉15所学校学生聚集于中华大学，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并发表恽代英起草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要求政府对青岛山东问题，应下坚决之心、“有进无退”。

6月1日，武昌学生团改名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发动、组织武汉6000名大中学生举行同盟罢课。罢课学生勇敢突破军警设防于各学校的严密围堵，冲上街头，不少学生被刺伤、逮捕。

惨案的发生引起武汉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各学校师生举行强烈抗议，恽代英、施洋等发起组织武汉各团联合会，汉口、武昌数千商家于10日至12日宣告罢市，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正在上海的董必武等亦以其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之名，先后向省内和全国发出通电，痛陈“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可发”，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严惩国贼，誓死力争。

受学生爱国行动的鼓舞，武汉工人群众开始罢工，并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5月下旬至6月初，汉口日资企业泰安纱厂工人及英租界和平、荣茂两花厂工人先后罢工。至7月中旬，武汉各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形成高潮。

武汉学生、工人和市民的爱国行动，影响了湖北地区中小城市的爱国群众。黄州、安陆、黄陂、沙市、宜昌、广济（今武穴市）、阳新、襄阳、蒲圻等地的学生和商人，纷纷举行示威和罢课、罢市。慑于群众爱国斗争的强大压力，湖北督军署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以中国政府拒绝在卖国屈辱的和约上签字而告终。它以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激发了学生、工人和中小商人等民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参与。其影响不仅及于政治、文化、商业等繁荣的大都市，而且波及众多中小城镇，甚至部分农村地区。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陈独秀、李大钊又一次成为引领运动发展的旗手。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等湖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成为湖北地区运动的前驱和领导力量。

自此，近代以来由社会精英主导的社会变革，开始有了更广泛的阶层参与，闭塞、落后的底层社会被灌入新鲜的时代气息，中国封建军阀专制的黑幕里继续展露丝丝光亮。

“民心不死，国尚可为”。这不断展现的曙光，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奏。

## 群英结党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它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姿态，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门。

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探寻的目光投向已经成功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到“民间去”成为先进的中国分子又一新的革命行动。

在湖北地区五四运动中起核心和领导作用的先进分子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施洋、黄负生、李求实、李书渠，也和全国的先进分子一起，开始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行动。

恽代英是湖北地区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通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典型。在他们进行艰难的革命探索 and 选择之时，以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则在实践中较早地作出了正确选择。

董必武是湖北地区参加过辛亥革命斗争的革命者之一，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曾两度东渡日本留学，一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袁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一次次失败，使他一度陷入苦闷之中。1919年2月，董必武由湖北至上海，在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湖北同乡李汉俊影响下，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湖北善后公会的名义连续向湖北及全国发出爱国通电。此时，以武汉学生代表身份来到上海的陈潭秋，也在此与董必武结识。他们一见如故，共同探讨革命道路，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革命友谊。

1919年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准备从

办报纸和学校入手，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在筹办报纸失败后，他们于1920年3月共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聘请钱介磐、刘子通、黄负生、赵子健等进步知识分子为教师。学校实行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和办法，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引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武汉中学由此成为湖北地区继利群书社之后又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影响下，一批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学生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湖北地区的早期党员、推动革命斗争逐步向全省发展的领导骨干。

中国先进分子在救亡图存的需要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不是将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来研究和探讨，而是作为振兴中华、救民于水火的一剂良方。以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的湖北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

1919年11月，恽代英首先在中华大学附中部筹建面向工农群众的湖北教育改进社。

1920年2月，少年中国学会、武昌工学互助团发起人之一的梁绍文，深入武汉工厂调查，撰写《武汉工厂调查》一文。

1920年4月，恽代英、李书渠、包惠僧等发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等筹备成立新教育社和湖北职业教育社，在武昌、汉口开办多处通俗学校、平民学校和工读学校，大力开展平民教育。

湖北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走近贫苦工人、城市贫民，将知识教育和革命宣传紧密结合，不仅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工人的现实生活，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逐步结合，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准备了

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主持成立。

在此之前，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的李汉俊，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来信，相约一起建党。董必武立即联系陈潭秋，进行组织准备。已经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湖北鄂城人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此时亦回到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一起协商筹建湖北共产党组织。8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等7人聚集于武昌抚院街97号，宣告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至1921年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增加3名成员——进步教师黄负生、刘子通和失业工人赵子俊。在发展新成员的同时，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恽代英及其领导的利群书社进行接触和联系时，对促进他们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等成立具有共产党组织性质的共存社，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共存社自动解散，其成员先后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地区的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全国共有59名党员。

59，这微不足道的数字，却蕴蓄着惊天动地的能量。59个创始者，用信念和双手捧出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59名共产党员，就有12名湖北人，他们分别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赵子



健、郑凯卿、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仁静、范鸿劼。他们怀揣改造旧中国的火焰，点燃自己的热血，同时也在中国大地上播下新的革命火种。

作为湖北党组织的创建人和革命斗争最早的领导人，董必武在后来怀念战友陈潭秋时深情地说，湖北革命斗争“我有点火作用，他（陈潭秋）把火搞大”。

### 工运风潮

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就改变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就是组织、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铁锤砸碎旧世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最壮丽的历史景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阶级利益的代表。党成立后，就制定了宣传和组织工人、发展工人运动的计划。董必武、陈潭秋从上海回汉后，在主持成立湖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的同时，迅速成立了以包惠僧、林育南先后为书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

武汉是近代以来工人人数仅次于上海和广州的城市。自1861年被迫开埠至洋务官僚张之洞主政湖北，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开放和发展，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广州最为发达的工商业城市。除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和店员外，产业工人数量也位居全国第三位。

武汉开展工人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湖北党组织极为重视这一工作。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李书渠、许白昊、项英、赵子健、郑凯卿等武汉地委的绝大多数

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更加频繁地走进武汉的街巷、码头和工厂；工人补习班、职工子弟学校和平民学校，在武汉工厂、工人和贫民集中的街道、里弄，纷纷开办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课堂里，武汉工人被迅速动员起来，工会组织纷纷建立，要求改善劳动待遇的呼声频起，工人自觉的罢工斗争开始爆发。

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罢工，揭开了武汉工人罢工斗争的序幕。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随后英美烟厂、湘鄂印刷厂、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英租界工人相继罢工。

至1922年10月，湖北党组织领导在武汉先后成立30多个工会，宣布联合成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由此引发的武汉工人罢工浪潮，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国极为少见。

这是武汉历史上从未有之大事件。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评价说：“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这股罢工潮迅猛发展，最终引发了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1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拟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包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余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及武汉学生联合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妇女界的代表共160余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郑州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劳动界的空前盛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各路段代表也纷纷汇聚，郑州洋溢着喜庆的热烈气氛。

此时，已经撕下“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大会举行，大批军警阻止代表进入会场。热烈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愤怒不已的代表们冲进会场，按计划举行会议，庄严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晚，大会决定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4日中午开始实行全路总罢工。

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当日上午9时，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汉口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一声令下，江岸机器厂罢工的汽笛长鸣，几个小时内，京汉铁路全线2万名工人相继全体罢工。

往日川流不息、运输繁忙的京汉铁路，顿时如死蛇般僵硬瘫痪。

大罢工一开始，军阀吴佩孚和英帝国主义就如临大敌，吴佩孚急电湖北督军肖耀南，要求实行严厉的武力镇压。

5日，湖北军警强抢两名火车司机，强迫升火开车。江岸总工会立即组织宣传队和2000多名纠察队员，将两名司机抢回。

6日和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和施洋带领2000余名各界代表到达江岸慰问、声援，与军警僵持对峙，气氛严峻。

一场湖北军警密谋策划的血腥屠杀公然进行。

7日下午，军警突然包围江岸分会，向工人发起突然袭击，一时枪声大作，弹如雨飞，不少工人应声倒地。工人纠察队员以木棍、铁棒与军警展开肉搏，副团长曾良玉等共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名工人受伤，共产党员、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

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电线杆上，汉黄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威逼他向罢工工人下复工令，遭到严词拒绝。

张厚生恼羞成怒，下令刽子手向林祥谦猛烈砍去。林祥谦身中三刀，仍忍着巨痛怒吼：“头可断，工不可复”，坚决不下复工令，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共产党员、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也在这一天被捕，农历除夕的 15 日晚被杀于武昌洪山脚下。

面对军警的枪口，施洋慷慨陈词：“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鬼，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其凛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

就在汉口江岸工人惨遭屠杀的同一天，郑州、长辛店及京汉铁路其他各站罢工工人也遭到军警镇压。共产党员和劳动者的鲜血染红了刽子手的屠刀。

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推向高潮的顶点。

这场罢工斗争和以前的工人罢工斗争一起，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充分锻炼和展示了高超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

带着这些成功与失败，伴随血的创伤和巨痛，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再次勇敢地走向革命斗争更加壮阔的大革命时期。